

「知青學」集大成之著

● 裴毅然

「知青學」在國外，當然不是我輩知青學人不自愛，不知此山有壁，而是老外更有條件比我們關心「知青」。不僅經費、精力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與研究的自由。



潘鳴嘯 (Michel Bonnin) 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知青運動遠去，知青研究漸熱。法國漢學家潘鳴嘯 (Michel Bonnin) 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以下簡稱《失落的一代》，引用只註頁碼)，厚厚四十萬字的集大成專著。筆者知青出身(八年鄉齡)，讀之感慨萬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從潘著所附參考文獻也可看出外文比中文熱鬧。

「知青學」在國外，當然不是我輩知青學人不自愛，不知此山有壁，而是老外更有條件比我們關心「知青」。不僅經費、精力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與研究的自由。由於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繫着文革，而且鈎掛着中共意識形態，涉及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只要文革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和所有赤左胎兒一樣，無法在寰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這場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上山下鄉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不是沒人報，而是不肯批——「穩定壓倒一切」。

因此，這一重大當代史課題，白白「讓」予人家老外。

當然，中國大陸「知青學」並非毫無進展一片空白，1990年代陸續出現一些台階性成果。如鄧賢《中國知青夢》(1993)，劉小萌等《中國知青事典》(1995)，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1996)，金大陸《世運與命運——關於老三屆人的生存與發展》(1998)，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1998)，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1998)，以及劉小萌編《中國知青口述史》(2004)。這些成果均屬初級階段的資料性掃描，提供了積微言細的原始資料，但由於是民間行為(除金大陸之作為上海市級課題)，大多為知青親歷，局限於下層個體親歷，即便涉及宏觀(如劉小萌、定宜莊的《中國知青史》)，亦受「必須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對出版嚴審雄關，作者必須「自覺」過濾。

一 資料貢獻

《失落的一代》對大量碎散的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歸納爬梳，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可謂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書中記載了許多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筆者來說仍是新聞，一路發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不僅當年被蒙在鼓裏，四十年後仍然不知內裏。原來1956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1963年周恩來計劃18年內動員3,500萬知青下

鄉(頁61)。上山下鄉乃是中共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借助紅色意識形態，將工業疲軟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既維護無所不能的中共神話，又遮了大面積失業之醜。至於逆向輸送青年精英會造成怎樣的歷史後果，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從未慮及，亦毋須慮及，反正他們永遠「偉光正」。

從《失落的一代》中可得知一系列秘聞：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1979年初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頁142)。1980年最後終結上山下鄉，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1979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中共政府只得放棄(頁163、166)。

——生產隊長、宣傳幹事、教師等當年混得不錯的「先進知青」，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萬惡的殖民地」，因為連他們也無法在廣闊天地「展望自己的未來」(頁300)。廣州動物園某員工因賣虎糞給知青被捕，虎糞有助逃港知青嚇退追捕警犬(頁367)。

——窺得知青英雄的續聞，如張鐵生、吳獻忠、柴春澤、朱克家、蔡立堅、侯雋、董加耕(頁159-60)。李慶霖三改刑期——從無期、十年到八年(頁160)。認識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歐陽璉(阿克蘇知青領袖)，因帶頭鬧返城被判刑四年(圖片36)。

——女知青普遍遭強姦之證據。黑龍江百餘農場，每所農場都上報數起，有的是幾十起(頁285)。據知青辦官方統計，僅1976年就有萬餘樁迫害知青事件，其中姦污

《失落的一代》對大量碎散的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歸納爬梳，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可謂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文革結束時，中共發現如不說謊就不能維持「安定團結」。上山下鄉的荒謬性已一清二楚，卻仍不能承認這是一項錯誤政策，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

女知青佔大多數，同年知青非自然死亡4,970件，佔知青總死亡人數73.5% (頁94)。

——《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 (頁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裏女知青給郊區小伙，被判「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頁211)！

——1974年4月，南京爆發遊行示威 (頁379)。1974年10月23日廣州十萬青年聚集白雲山，放飛數百風箏，風箏飄語：「順風順水去到尖沙咀！」 (頁377) 1984年，1.7萬上海知青被勸返新疆 (頁189)。民主牆時期，上海知青王輔臣在人民廣場張貼大字報：「大黨閥、大軍閥、大獨裁者——毛澤東，上海人民決不會饒恕你。」 (頁408) 1980年10月29日，插隊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剛因不能回城而製造北京火車站特大爆炸事件——10死 (應為9死，參見魏博民：〈北京火車站爆炸案真相〉，載《建國後二十樁重大反革命案件紀實》〔北京：求實出版社，1990〕，頁1-7) 81傷 (頁196)。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各地知青運動風起雲湧。京滬寧杭滬贛皖都有動靜，上海知青用臥軌「擴大影響」，遊行、絕食、請願，持續一月，高呼口號：「要工作，要吃飯，要戶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反動」。滬青民運領袖滕滬生被捕。大多數農場這一期間均出現自殺事件 (頁144-47)。甚至出現「反動至極」的請願語：「勞改犯服刑期滿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們反而不如勞改犯，這麼長時間了還不允許我們返回北京！」 (頁197)

——文革結束時，中共發現如不說謊就不能維持「安定團結」。

1978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70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 (頁130)。鄧小平也認可這一說法，上山下鄉的荒謬性已一清二楚，卻仍不能承認這是一項錯誤政策，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頁131)

——1967年秋，幾位法國共青團領導訪華，受毛氏理論啟迪，回國發起「插入運動」，影響數百法國青年放棄學業，在城市「插廠」 (頁434)。1970年代初，數千名法國青年再掀「回歸土地」運動，堅持七八年，最後吃癩 (頁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鮮血寫就的歷史正像毛澤東主義的恐怖寫照，特別是下鄉運動時期提出來的某些指示。」 (頁432) 1972年，一名台灣學者居然稱上山下鄉為「理性而大膽的」實驗 (頁44)。幾則隔岸「新聞」讀得筆者陣陣驚悚。

《失落的一代》還提供了一系列數據：80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 (頁202)。1980年仍有15.5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43萬 (頁168)。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 (頁213)。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100多萬，技校生減少200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頁411)。列示數據，結論自明。

為安置知青，國家為每位知青投資500元，插隊178至303元／人，

到農場去的690至1,119元／人(頁61)。內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當中級幹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頁160)。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在社隊工廠需1,300元／人，安置在鄉鎮企業僅需500元／人，知青下鄉比辦廠還昂貴(頁166)。國家投資46億辦農場，虧損32億(頁399)。

歪謬之屋一定建於歪謬地基，一定有歪謬的價值支撐，今人當然都認清了那枚封建臂章——權爭，毛為了一己之權毀了一國之政，為了一己之欲搭上全國之益。

二 分析深刻

《失落的一代》分析的深刻性，亦達「知青學」前沿。雖然分析知青運動難度不高，但中國大陸學者受制於「局限」，特別是那位揮手動員者的巨像還高高懸掛，知青研究就必須戴着鐐銬起舞，囊內學者就無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無法伸直邏輯之腿：

——下鄉屬於最具專制之列。這種強制性的放逐邊遠地區從事體力勞動無疑就是流放。當權者擁有對人民的極大權力，而老百姓為保護自身幾乎走投無路，這一現實在運動中暴露無遺(頁430)。

——農村勞動力閒置不是很顯眼的事情，與城鎮失業相比，政治上的危險性也比較小，而知青混在農民群眾中也不會造成駭人聽聞的人口增長數字。上山下鄉運動完全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而是掩

蓋問題的辦法。它使人忽略了擴大就業的很多機會(頁390-391)。

——大多數情況下，愈是呱呱大叫要扎根農村，就愈有機會離開，等於公開鼓勵口是心非(頁307)。全面打亂道德禁條，結果就是極大地削弱這些禁條對精神的控制力。知青們學會了把以前他們譴責的所作所為看成是正常的(頁346)。

——仇視知識份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亂，下鄉運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鄉運動與毛的有關教育培養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現知識份子及滋長批判精神。毛一向認為鄉下人的道德精神遠高於城市人(頁429)。

——毛也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國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23)。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22-23)。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223)。農民懷念集體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還談到解放前(頁227-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謂「歷史使命」為名，君王式地蔑視社會經濟利益而命令全體社會成員必須服從他的安排(頁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種不公平的犧牲品(頁412)。

——「老三屆」從童年開始就被灌輸戰爭神聖偉大的思想。各類宣傳不斷向他們顯示戰爭是通往光榮

對中國大陸知青學者來說，提煉撮抓上山下鄉的「親身感受」似應更方便更容易，可絕大多數國內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

知青下鄉運動是當代世界史一道獨異的「人文風景」，凝聚着種種不可複製的「歷史特色」。千萬知青還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們還在不斷出新聞。中共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

的道路。知青們都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一打，起碼可以變一變。要死，死在戰場上，誰知道呀，當個英雄，總比憋死在這個破地方強。」一位海南知青回憶：「我幻想着哪一天世界革命爆發，我們知青便可以告別農村，殺向歐美。」（頁364）

對中國大陸知青學者來說，提煉撮抓上山下鄉的「親身感受」似應更方便更容易，他們當然更理解這些由皮肉得來的真理。可這些頂在嘴邊的話，絕大多數國內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失落的一代》之深刻因此得到映襯——言我們所未言或不敢言。

三 宏觀思考

依靠《失落的一代》所提供的全局資訊與宏觀數據，1,800萬知青（頁170）、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的廢品（頁155）。

1977至79年三屆，只有43.9萬知青進入大學（頁177），加上其他渠道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估計總數不超過百萬。1/18的成才率既是1,700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級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頁184）。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觸目的賢愚倒置。

從五四民主自由的起點，最後竟拐入比滿清還暴虐的專制，難道不是二十世紀中國士林的集體失

職？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麼會讓封建專制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歷史造成的」，就能避開文化追責嗎？為甚麼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甚麼我們對赤左謬說只能「實踐而後知」？

上山下鄉不僅僅使整整一代人被耽擱，國家資源大浪費，而且做了比無用功更可怕的反作用力，留下滿地赤左瓦礫。1978年，中央還在致力於「在全社會樹立以務農為榮的新思想」（頁404）。1977年底決定恢復高考後，天津市長發現大學新生中工農子弟比重降低，立即打報告揭發「新的招生制度使新生的階級成份改變」，若非鄧小平答覆「救國要緊」，還不知會折騰出甚麼「革命行動」來（頁412）。

更使筆者心頭作痛的是知青集體跪求的圖片。1979年2月，雲南勐臘農場千餘知青跪地向農墾總局局長哭求：「我們要回家！」（頁141）這樣一代依靠下跪維權的青年，能為他們身後更為孱弱的農民爭取站立的人權麼？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價值與意義，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頁424）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事實上，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使他們認清甚麼是反現實。由於上山下鄉是歷史的「逆向行駛」，知青成

「傻青」，愚蠢地浪費了一代人的青春與智力，還支付了巨大的道德成本，動搖了「真實」這一社會之本。當人人戴着面具才敢出門，當人人心裏運行兩套價值邏輯，街上還能看見「真實」麼？

知青下鄉運動也是國際共運之孤本，也是當代世界史一道獨異的「人文風景」，凝聚着種種不可複製的「歷史特色」。千萬知青還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們還在不斷出新聞。中共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退休後的「同等待遇」請願，各地知青協會仍是最有號召力的社會團體，「知青現象」還在延續。此外，上山下鄉所附帶的一系列後續效應，如教育普遍不足所造成的對後代的文化輸氧偏低、由文化低弱對無知的下意識崇拜、對暴力的下意識認同……「知青學」可望在今後二三十年間持續走熱。

四 商榷探討

潘鳴嘯認為「經濟問題不是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他在《社會科學報》重申這一觀點（潘鳴嘯：〈經濟問題不是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社會科學報》〔上海〕，2009年5月28日）。對此，筆者認為需要商榷。因為，從表面上，確實是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主導了這場大運動，但從根子上則離不開經濟因素，即扔甩失業包袱。當然，之所以會產生失業包袱，最終原因還在政治，即中共從1950年代中期就發現赤色設計無法貫徹，公有制並未分泌出「巨大生產力」，經濟一路疲軟，這

才不得不借政治高調裹經濟失敗的肉身。如果當時各地工廠盯着向中央討要青年員工，而且是需要具備一定文化知識的青年，相信任何一位政治領導人都不會也不敢發動這場城鄉勞力大對流的知青運動——1,800萬城鎮知青下鄉，800萬農村青年進城（頁37）。更不用說還要冒巨大政治風險：植恨千萬城鎮家庭。一場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當然是政治經濟及時勢等諸因之合，單因釋源難免顧此失彼。

儘管政治原因在所有共產國家永遠是第一位的，但具體到知青下鄉運動，乃是意識形態造成經濟疲軟萎縮，從而合成這一紅色怪胎。意識形態使中共自封萬能救世主，決不允許出現失業，但三年文革（1966-1968），全國只抓革命不促生產，政府財力日蹙，應付「吃飯財政」尚不及，不可能通過工業化以提供職崗。同時，大學停辦，高中縮招，三屆積壓的大中專畢業生嗷嗷待崗，必須安置，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情急之下，毛澤東只能利用「領袖魅力」送他們下鄉「就業」，既顧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續意識形態神話，也顧了經濟上的裏子——遮掩無法安置就業之實。

有始必有終，凡有開初必有結果。飲鴆止渴的上山下鄉使國人真正認清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成果」，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認清」不發展經濟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工作重心的轉移」。

最後，再次感謝潘鳴嘯先生，感謝這位老外對中國知青運動二十餘年的關注。

知青下鄉運動乃是意識形態造成經濟疲軟萎縮，從而合成這一紅色怪胎。毛澤東只能利用「領袖魅力」送知青下鄉「就業」，既顧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續意識形態神話，也顧了經濟上的裏子——遮掩無法安置就業之實。